

反倾销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研究

许和连;徐志珮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79)

摘要: 本文基于 2000-2013 年的全球反倾销 (GAD) 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 (DID) 模型, 从产品调整的角度考察反倾销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 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显著增加了涉案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 即存在“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此外, 反倾销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具有差异化影响, 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更容易实现出口产品的转移。进一步研究发现, 反倾销是通过贸易成本和资源配置两个途径影响涉案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出口。基于以上结论, 一方面要鼓励出口企业发展产品多元化战略, 并根据市场动态变化采取积极的产品调整策略, 另一方面要引导出口企业建立和完善反倾销的应对机制, 并通过政策支持, 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生存能力。

关键词: (反倾销调查; 贸易转移效应; 多产品企业; 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 关税、配额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已经逐渐减少, 一些非关税壁垒则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和合理性而被大量采用。作为 WTO 认定的合法贸易救济手段, 反倾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国外商品的进口, 保护国内产业。据 WTO 统计, 在 1995 年到 2020 年 6 月期间, 全球反倾销案件数高达 6139 起, 是使用最多的贸易救济手段。由此可见, 当前反倾销调查已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导形式”。

当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贸易国, 但与此同时, 中国也成为了遭受反倾销调查最为频繁的国家。据 WTO 统计, 从 1995 年到 2020 年 6 月, 中国总共遭受了美国、欧盟、印度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调查, 案件数量高达 1140 起, 占世界总数量的 23.5%, 居世界第一位,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健康发展。

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稳步前行并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是中国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 如何引导中国的出口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 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 在全部出口企业中, 多产品出口企业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产品调整是多产品企业出口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决策, 也是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鉴于此, 本文以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为研究对象, 从产品调整视角考察反倾销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

二、文献综述

作为最常用的贸易救济方式, 反倾销一直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 关于反倾销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对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研究, 主要包含政治和经济两大因素; 二是对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Vandenbussche H et al (2010) 研究发现, 反倾销调查产生了远远超出预期的巨大的贸易限制效应。Baylis 等 (2010) 研究发现, 当墨西哥的番茄产品受美国反倾销调查后, 企业也会转向出口其近似产品。陈汉林等 (2010) 基于美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 利用统计学方法, 发现大多数反倾销案件都会使商品至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大。陈阵和孙若瀛 (2013) 在研究中发现, 美国对华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企业绩效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王孝松等 (2015) 使用多维数据, 利用引力模型。研究表明反倾销调查极大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且在不同行业有所不同。蒋为等 (2016) 从企业异质性角度, 利用 PSM-DID 方法, 研究发现美国的反倾销

调查不仅对涉案产品的出口有负面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倾销品的出口。黄新飞等(2017)研究发现,当贸易伙伴国受到反倾销时,有利于我国企业出口增长的外延边际,但不利于出口增长的价格边际和内涵边际。李晓琴等(2017)基于美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他们认为,由于征收反倾销税,使得涉案产品出口到发起国的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了显著的贸易偏转效应。

本文还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文献相关。在特征性事实方面,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多产品企业内部存在十分频繁的出口产品调整行为。Iacovone等(2010)通过对墨西哥企业出口数据统计得出,约三分之一的墨西哥出口企业进行了产品组合的调整。钱学锋(2013)发现在我国出口企业中,多产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多产品企业内部存在非常普遍的出口调整行为。Timoshenko等(2015)以巴西企业的出口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72%的巴西出口企业进行了出口产品组合的调整。仪珊珊(2018)利用我国微观企业的出口数据,结果表明,每年有近80%的出口企业选择改变原有的出口产品组合。

在影响因素方面,Berthou等(2013)研究发现,1999年欧元区后,由于贸易成本的下降,法国多产品企业增加了出口至欧元区国家的产品种类,但这种影响只限于生产率高的企业。钱学锋等(2013)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企业通过减少出口产品种类,从而将资源转移到更具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上。Qiu等(2014)基于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数据,分析得出,进口国单方面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差异化影响。其中,管理成本高的企业会减少出口的产品种类,管理成本低的企业则增加出口的产品种类。亢梅玲等(2016)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关税减免,企业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取更加丰富的中间投入品,有利于企业进行出口产品组合的调整。涂远芬(2020)构建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理论模型,发现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多产品企业会缩减出口产品范围,从而将资源集中到更具竞争力的核心产品。

在福利效应方面,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与工资、生产率、企业规模等之间的关系。de Nardis等(2009)利用意大利的企业层级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增加或同时增加减少出口产品时,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也随之提高。Bernard等(2010)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企业的出口产品调整行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企业绩效。Alvarez等(2014)利用智利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企业的出口产品调整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差异化影响。对于大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会引起企业规模的扩张,而对于中小企业,则表现为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易靖韬等(2017)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数据,发现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组合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绩效,进而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董银果和黄俊闻(2018)在研究中发现,日本植物与卫生检疫标准的提高会促使中国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组合,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看到,目前关于反倾销的文献层出不穷,这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未涉猎的角度。首先,已有研究多从行业角度探究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而从企业角度,也更多针对反倾销调查对企业出口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调整考虑较少。中国连续多年都是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从微观角度研究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十分重要。其次,目前关于反倾销的研究以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为研究对象。事实上,印度是对华反倾销调查次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欧盟紧随其后。因此,本文尝试以所有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为研究对象,考察国外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以求得到更具一般性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贸易成本效应

“贸易成本”的概念是由 Samuelson (1952) 首次提出。他指出, 贸易成本是指在货物跨境交易时, 损失的那一部分货物价值。Denand Mosch (2003) 在文献中阐述, 贸易成本除了运输成本外, 还有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等。Anderson 等(2004)对已有文献进行总结, 提出贸易成本是将货物的生产成本排除在外的, 货物在跨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成本。该概念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也是本文所采用的贸易成本概念。根据 Melitz (2003) 的异质性企业理论, 在面临不确定的外部冲击时, 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往往会选择最优的出口频率, 以减少订货成本、运输成本等贸易成本。Bernard 等 (2010) 在研究中阐述, 随着可变贸易成本的下降, 企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也随之降低, 由于需求弹性, 企业的收入和可变利润也会随之增加。Nicita and Rollo (2015) 通过比较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数据, 分析市场准入引起的贸易成本的下降是否会影响出口多样化。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准入条件仍然很重要, 贸易关系的存在不仅取决于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 还取决于这些条件与外国竞争对手的比较情况。Balavac and Pugh (2016) 研究了 1996-2010 年 25 个转型经济体中贸易开放和出口多样化问题, 他们发现两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会扩大企业的出口规模, 同时提高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水平。根据上述经验研究, 我们提出假说 1:

假说 1: 反倾销调查发生后, 我国企业涉案产品的出口成本上升, 同时意味着非倾销品至指控国的贸易成本相对降低, 其出口额将会增加。

（二）资源配置效应

无论是从效率改进, 或从要素的合理利用角度, 资源配置效应都在企业出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Melitz (2003) 指出, 贸易自由化会诱使高效率进入出口市场, 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Bernard 等 (2010) 以加入加拿大和美国自由贸易协定 (CUSFTA) 作为自然实验, 使用双重差分 (DID) 模型研究发现, 关税下降会促使美国企业重新配置内部资源, 集中生产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品。蒋灵多和陈勇兵 (2015) 认为, 当面临外生冲击时, 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能够减少外生冲击带来的损失。具体而言, 要将资源从边缘产品转移至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上, 使企业的出口更加持续。高云舒等 (2021) 从出口关税变化的角度, 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多产品企业产品组合的影响, 结果表明, 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集中生产一种或多种具有优势的产品。根据上述经验研究, 我们提出假说 2:

假说 2: 反倾销调查发生后, 由于涉案产品在特定市场及全球市场中的数量减少, 原本偏向涉案产品的资源向核心的非倾销产品转移, 促使核心非倾销产品的出口额提高。

四、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全球反倾销 (GAD) 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其中, 全球反倾销 (GAD) 数据库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所有反倾销申诉案例的具体情况: 如涉案产品名称、涉案产品编码 (HS-10)、立案时间等。本文从该数据库中整理了 2000-2013 年的全部案件信息。另外, 本文采用 2000-2013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同时按如下方法处理数据: 1、删除工人数量少于 10 的企业。2、删除缺少某些变量的企业。3、删除不符合会计原则的企业。

关于以上三个数据库的合并, 首先, 本文根据企业名称和电话号码后 7 位, 对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匹配。在此基础上, 通过产品 HS-6 代码, 将上述数据与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相匹配。最后, 因为本文考察的是反倾销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 在处理数据时, 本文只保留了出口二种或二种产品以上的企业。

（二）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反倾销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借鉴 Lu 等（2018）的做法，本文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识别方式如下：处理组是涉案企业（记为企业 A）生产的与反倾销产品（记为产品 1）位于同一 HS4 位码下的非倾销产品（记为产品 2），控制组是没有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企业（记为企业 B）生产的与反倾销产品位于同一 HS4 位码下的非倾销产品（记为产品 2）作为对照组，如图 4.1 所示。观察在反倾销后企业是否会在产品调整方面作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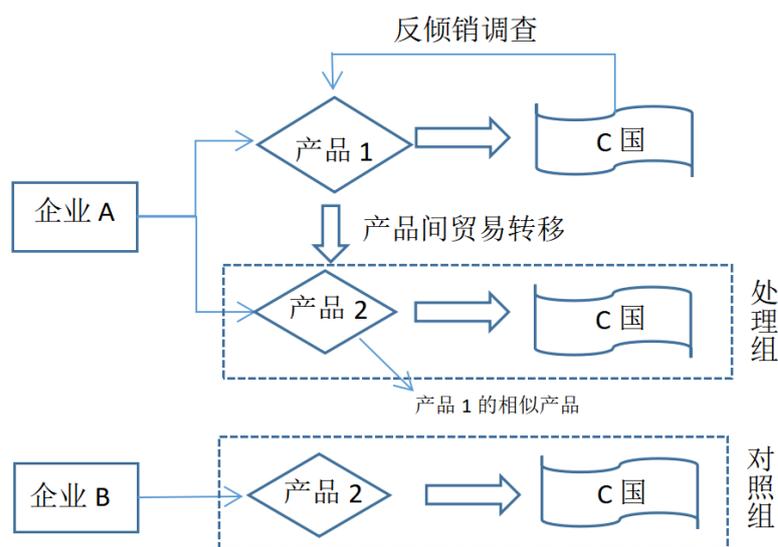


图 4.1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选择

回归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_{fhtc} = \beta_0 + \beta_1 AD_{fct} + \beta_2 X_{ft} + \lambda_{ch} + \lambda_f + \lambda_t + \varepsilon_{fhtc}$$

其中，下标 f 、 h 、 c 、 t 分别表示出口企业、HS6 非倾销产品、出口目的国（反倾销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Y_{fhtc} 分别为出口数量、金额和价格，它们都是企业 f 向反倾销国 c 出口的非倾销产品 h 的出口指标。变量 AD_{fct} 是两个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表示为 $AD_{fct} = Treatment_{fc} * Post_{fct}$ ，其中， $Treatment_{fc}$ 为企业 f 有没有遭受 c 国反倾销调查，如果企业 f 出口的产品曾受到 c 国反倾销调查，即企业受到了反倾销调查的影响，那么 $Treatment_{fc} = 1$ ，否则 $Treatment_{fc} = 0$ ； $Post_{fct}$ 表示企业 f 在第 t 年有没有遭受 c 国反倾销调查，如果企业第一次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时间在 t 之前，我们认为企业 f 在第 t 年受到了 c 国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即 $Post_{fct} = 1$ ，否则为 0。系数 β_1 反映了反倾销调查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关系，其意义体现在：如果企业 A 的产品 1 受到了一国的反倾销调查，那么相比出口了相似产品（与反倾销产品位于同一 HS4 位码下的非倾销产品）至该国的未受反倾销影响的企业 B，企业 A 出口同样相似产品至该国的出口规模有多大程度的提高。 X_{ft} 是控制变量，具体为企业生产率、企业资本密集度和企业规模， λ_{ch} 、 λ_f 和 λ_t 分别为国家-产品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ε_{fhtc} 是误差项，同时在国家-企业-产品水平上进行聚类。

（三）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非倾销的产品出口指标。具体为，企业 f 当年出口至 c 国的非倾销产品 h

的出口额 (value)、出口数量 (quantity) 和出口价格 (price)。解释变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 AD_{fct} ，其定义如上文所示。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 (size)、企业生产率 ($\log(LP)$) 和企业资本密集度 ($\log(cpt)$) 作为控制变量。首先，规模越大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线越多，出口的产品种类也越多，当受到反倾销调查后，更容易实现出口产品的调整，企业规模对贸易转移的预期作用为正。其次，企业生产率越高，在同样的时间内，企业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从而在面对外生冲击时，能够灵活进行出口产品的调整，企业生产率对贸易转移的预期作用为正。最后，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的资金周转更加方便快捷，这有利于产品调整，企业生产率对贸易转移的预期作用为正。

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国家-产品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1。

表 4.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lnvalue	208,641	10.32	2.857	0.693	22.60
lnquantity	208,641	7.563	3.181	0	22.62
lnprice	206,974	2.265	1.827	0	15.50
AD	208,641	0.235	0.424	0	1
size	198,654	5.663	1.169	0	12.29
$\log(LP)$	138,741	3.976	1.159	-5.690	11.80
$\log(cpt)$	198,644	5.454	1.185	-2.001	14.7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平行趋势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分别考察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出口额和出口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 4.2 和图 4.3 所示。不难看出，current 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大体上相同。但是在 current 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这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参照组是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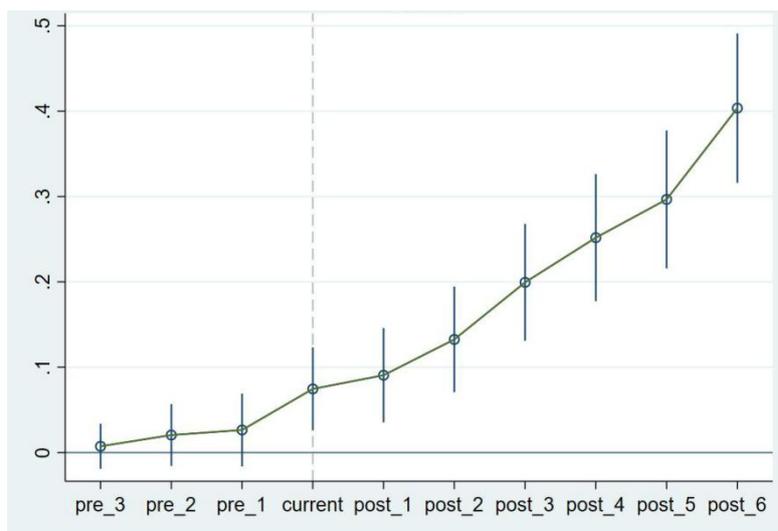


图 4.2 平行趋势-出口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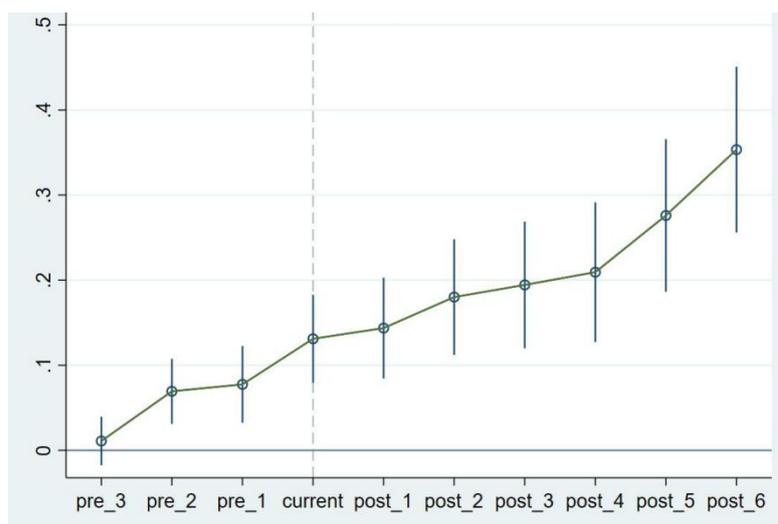


图 4.3 平行趋势-出口数量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回归结果见 4.2。第 (1) (3) (5) 列仅控制了固定效应。第 (2) (4) (6) 列不仅包含固定效应，还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可以看到，反倾销调查的估计系数全都显著为正。第 (1) (2) 列显示，当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后，其非倾销产品至指控国的出口额增加了 21.7%。第 (3) (4) 列显示，反倾销使涉案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量增加了 13.9%，但是反倾销对非倾销产品的价格无明显影响。龙小宁，方菲菲（2018）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理由为：如果提高价格，该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会随之减弱，而降低价格则会使该商品受到目的国的反倾销，两者都无法促进出口而不被反倾销。因此，反倾销的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主要通过非倾销品的出口量，而非价格进行调整。

表 4.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VARIABLES	Invalue	Invalue	Inquantity	Inquantity	Inprice	Inprice
AD	0.218*** (0.0322)	0.217*** (0.0374)	0.133*** (0.0282)	0.139*** (0.0327)	0.0157 (0.0132)	0.0207 (0.0159)
size		0.281*** (0.0299)		0.120*** (0.0265)		-0.00543 (0.0115)
log(LP)		0.0987*** (0.0123)		0.0127 (0.0122)		0.0314*** (0.00505)
log(cpt)		0.119*** (0.0238)		0.0443* (0.0227)		0.000320 (0.00892)
Constant	10.34*** (0.00781)	7.651*** (0.286)	7.563*** (0.00685)	6.526*** (0.259)	2.260*** (0.00321)	2.100*** (0.108)
Observations	192,767	128,023	192,767	128,023	191,108	127,100
R-squared	0.578	0.593	0.673	0.684	0.816	0.827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justed R2	0.786	0.786	0.786	0.786	0.786	0.786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并已在国家-产品水平上进行聚类处理。

(三) 异质性分析

事实上,不同特征的企业对反倾销的反应是有所差异的。有些企业在受到反倾销调查后,出口大幅缩减,或直接退出市场。相反,有些企业则能够继续维持之前的出口。考虑到长期以来的政府扶持政策,本文利用分组回归,探究政府补贴将如何影响反倾销和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关系。

表 4.3 报告的是将样本企业按照受政府补贴和不受政府补贴两种企业类型划分的子样本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1)(2)(3)(4)列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相对于未受政府补贴的企业,受补贴企业的回归系数明显更大,这表明反倾销调查发生后,受补贴的企业更容易实现出口产品的转换。可能的原因有:受补贴企业通常为地方重点扶持型企业,这种类型的企业在生产率、新产品研发能力、出口产品质量等方面要优于其他企业。另一方面,在反倾销发生之后,这种类型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经营和融资能力,用来缓解企业内外部融资约束,同时利用产品间的出口转换策略减少反倾销调查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表 4.3 按企业是否受政府补贴的分组回归结果

VARIABLES	受补贴			未受补贴		
	(1)	(2)	(3)	(1)	(2)	(3)
	Invalue	Inquantity	Inprice	Invalue	Inquantity	Inprice
AD	0.363*** (0.0675)	0.201*** (0.0618)	0.0599** (0.0272)	0.184*** (0.0428)	0.118*** (0.0371)	0.0122 (0.0181)
size	0.229*** (0.0755)	0.0154 (0.0707)	0.00580 (0.0312)	0.274*** (0.0358)	0.103*** (0.0325)	0.00116 (0.0131)
log(LP)	0.0652** (0.0295)	-0.0288 (0.0317)	0.0338** (0.0151)	0.0983*** (0.0158)	-0.000807 (0.0161)	0.0343*** (0.00613)
log(cpt)	0.128* (0.0702)	-0.00635 (0.0654)	0.0364 (0.0277)	0.106*** (0.0270)	0.0489* (0.0260)	-0.00681 (0.00968)
Constant	7.918*** (0.800)	7.464*** (0.751)	1.827*** (0.320)	7.818*** (0.326)	6.696*** (0.303)	2.085*** (0.120)
Observations	31,987	31,987	31,766	91,913	91,913	91,210
R-squared	0.649	0.726	0.835	0.611	0.698	0.839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justed R2	0.777	0.777	0.777	0.793	0.793	0.793

(四) 稳健性检验

1、去除加工贸易的影响

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余淼杰(2016)认为,加工贸易可以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因此,我们在表 4.4 中汇报了将加工贸易剔除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与前文的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加工贸易并没有使我们的基本回归结果有偏误。

表 4.4 去除加工贸易后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VARIABLES	lnvalue	lnvalue	lnquantity	lnquantity	lnprice	lnprice
AD	0.298*** (0.0360)	0.293*** (0.0412)	0.163*** (0.0332)	0.166*** (0.0384)	0.0307** (0.0136)	0.0267 (0.0167)
size		0.250*** (0.0337)		0.0966*** (0.0316)		-0.0115 (0.0147)
log(LP)		0.0897*** (0.0149)		-0.00183 (0.0151)		0.0274*** (0.00644)
log(cpt)		0.0728*** (0.0251)		0.0110 (0.0259)		0.00227 (0.0103)
Constant	10.13*** (0.00876)	7.938*** (0.310)	7.410*** (0.00809)	6.760*** (0.304)	2.264*** (0.00331)	2.155*** (0.134)
Observations	146,602	98,900	146,602	98,900	145,295	98,174
R-squared	0.589	0.603	0.689	0.699	0.829	0.838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justed R2	0.794	0.794	0.794	0.794	0.794	0.794

2、去除同时被多个国家调查的案例

事实上，反倾销调查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发起国和涉案国之间，而且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引发其他国家针对涉案产品开展贸易救济措施。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18年4月份美国对我国钢制轮毂启动了“双反”调查后，仅2018年5月份，就先后有哥伦比亚、黎巴嫩、巴西和欧盟对我国钢铁产品提起了反倾销调查。因此，在样本区间内，如果我国出口产品同时受到多个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那么我们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影响，我们在表 4.5 中汇报了去除同时被多个国家调查的案例后的回归结果。表 4.5 的结果显示，我们的基本结果在去除被多个国家调查的案例后依然是稳健的。

表 4.5 去除同时被多个国家调查的案例后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VARIABLES	lnvalue	lnvalue	lnquantity	lnquantity	lnprice	lnprice
AD	0.240*** (0.0443)	0.235*** (0.0554)	0.129*** (0.0376)	0.122** (0.0484)	0.0387** (0.0186)	0.0503** (0.0235)
size		0.222***		0.0900**		-0.0145

		(0.0440)		(0.0393)		(0.0170)
log(LP)		0.0712***		-0.00441		0.0232***
		(0.0184)		(0.0181)		(0.00803)
log(cpt)		0.102***		0.0337		0.00147
		(0.0364)		(0.0334)		(0.0124)
Constant	10.25***	8.102***	7.666***	6.926***	2.227***	2.155***
	(0.00907)	(0.438)	(0.00771)	(0.390)	(0.00381)	(0.155)
Observations	95,569	56,625	95,569	56,625	94,615	56,111
R-squared	0.639	0.659	0.702	0.715	0.816	0.817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3、剔除异常值

剔除异常值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4.6。可以看到，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表 4.6 剔除异常值后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VARIABLES	lnvalue_w	lnvalue_w	lnquantity_w	lnquantity_w	lnprice_w	lnprice_w
AD	0.217***	0.216***	0.132***	0.137***	0.0114	0.0158
	(0.0315)	(0.0368)	(0.0278)	(0.0322)	(0.0130)	(0.0157)
size		0.277***		0.121***		-0.00318
		(0.0295)		(0.0262)		(0.0109)
log(LP)		0.0967***		0.0131		0.0287***
		(0.0121)		(0.0120)		(0.00476)
log(cpt)		0.117***		0.0444**		0.00116
		(0.0236)		(0.0223)		(0.00856)
Constant	10.35***	7.696***	7.556***	6.514***	2.248***	2.083***
	(0.00766)	(0.282)	(0.00674)	(0.255)	(0.00316)	(0.103)
Observations	192,767	128,023	192,767	128,023	191,108	127,100
R-squared	0.578	0.593	0.672	0.684	0.822	0.832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justed R2	0.793	0.793	0.793	0.793	0.793	0.793

五、影响机制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反倾销显著增加了涉案企业非倾销产品对指控国的出口。那么，

反倾销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涉案企业出口产品调整呢？本文推测这是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途径引起的。在该部分，本文将分别对这两个机制进行验证。

（一）贸易成本效应

本文认为反倾销调查发生后，对涉案企业而言，涉案产品出口至发起国的贸易成本提高。这表明非倾销品至所有国家的贸易成本都应该降低。如果该机制成立的话，非倾销品也应该加大对别的国家的出口。因此，本文使用非倾销品至其他国家的出口额、出口量和出口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表 4.7 非倾销品至其他国家的出口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5)	(6)
	lnvalue	lnvalue	lnquantity	lnquantity	lnprice	lnprice
AD	0.0229*	0.0251**	0.0163	0.0262**	-0.00518	-0.0114**
	(0.0118)	(0.0122)	(0.0112)	(0.0117)	(0.00530)	(0.00560)
size		4.38e-05***		3.10e-05***		-5.85e-06**
		(5.74e-06)		(6.29e-06)		(2.83e-06)
log(LP)		0.0503***		0.0265***		0.00865***
		(0.00529)		(0.00565)		(0.00293)
log(cpt)		0.0985***		0.0203**		-0.00184
		(0.00803)		(0.00819)		(0.00391)
Constant	10.45***	8.982***	7.669***	7.261***	1.985***	1.972***
	(0.00285)	(0.0906)	(0.00271)	(0.0913)	(0.00128)	(0.0423)
Observations	952,980	903,193	952,980	903,193	947,433	897,830
R-squared	0.497	0.497	0.669	0.672	0.862	0.862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usted R2	0.848	0.848	0.848	0.848	0.848	0.848

回归结果如表 4.7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后，反倾销调查使涉案企业非倾销品至其他国家的出口额和出口量都显著增加，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另外，我们还发现反倾销调查非倾销至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下降了，这与我们的基准结果有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非倾销品在其他国家市场上受反倾销的概率要远小于指控国市场，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影响非倾销品的出口。该结果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推断，即反倾销调查后，涉案企业非倾销品的贸易成本相对下降，非倾销品的出口增加。

（二）资源配置效应

本文认为企业受到反倾销调查后，由于涉案产品出口数量的减少，企业内原本偏向涉案产品的内部资源会转移至其核心的非倾销产品，使得核心非倾销品的出口份额提高。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本文对反倾销发生后，核心非倾销品的出口份额变化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参考 Mayer, Melitz 和 Ottaviano (2014) 的测度方法，将企业出口额最高的非倾销产品定义为核心非倾销品，用企业核心非倾销产品出口额与出口额占第二位的非倾销品之间的比值来衡量核心非倾销品的出口份额变化。测度方法如下：

$$Mix_{fct} = \log(\text{value}_{fbct} / \text{value}_{fsct})$$

其中， value_{fbct} 和 value_{fsct} 分别表示核心非倾销品和出口额第二高的非倾销品的出口额。本文分别采用指控国市场和其他国家市场的 Mix_{fct}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表 4.8 反倾销对核心非倾销品出口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指控国市场		其他国家市场	
	mix	mix	mix	mix
AD	0.0689** (0.0339)	0.0986*** (0.0372)	0.0713*** (0.0133)	0.0681*** (0.0136)
size		-0.0375 (0.0365)		3.99e-05*** (8.03e-06)
log(LP)		0.0526*** (0.0194)		0.0588*** (0.00898)
log(cpt)		-0.00579 (0.0333)		-0.0410*** (0.0139)
Constant	-1.509*** (0.00872)	-1.259*** (0.361)	-1.306*** (0.00382)	-1.250*** (0.156)
Observations	88,386	64,160	386,762	359,980
R-squared	0.724	0.743	0.620	0.629
Country-Product FE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justed R2	0.660	0.660	0.574	0.574

表 4.8 报告了反倾销对涉案企业核心非倾销品出口份额的影响。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指控国还是其他国家市场，反倾销对涉案企业核心非倾销品的出口份额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当反倾销调查使涉案产品出口缩减的同时，企业会将原本偏向涉案产品的内部资源转移至核心非倾销品，促使核心非倾销品出口额的上升，从而验证了假说 2。此外，我们发现企业资本密集度对核心非倾销品的出口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新产品的研发能力越强，出口份额在各个有竞争力产品之间可能会比较平均。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了反倾销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本文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反倾销措施显著增加了涉案企业非倾销产品至指控国的出口额和出口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反倾销调查使涉案企业非倾销品至其他国家的出口额和出口量也显著上升，说明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出口策略来减少反倾销带来的损失。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更容易实现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另外，对于一般贸易企业，反倾销调查显著增加了涉案企业的非倾销产

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而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反倾销却对涉案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出口无明显影响。第三、当反倾销调查使涉案产品出口缩减的同时,企业会将原本偏向涉案产品的内部资源转移至核心非倾销品,促使核心非倾销品出口额的上升。针对上述结论,我们主要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一方面,建议企业要多元化的出口产品,同时根据市场动态和企业特征采取积极的出口产品转换策略。一方面,要通过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放弃边际成本高的边缘化产品,将资源聚焦于更具竞争力的核心产品,提高核心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整体生产效率,加速企业盈利,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国际市场进入成本,减少企业出口风险。另一方面,企业也应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积极开发新产品,增加出口产品种类,从而在受到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可以灵活地进行出口产品的转换,缓解反倾销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要引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源从边缘产品转移至核心产品,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生产率,加速企业盈利。政府还应了解国际市场环境,对我国企业的出口活动开展及时有效的指导,从而使我国企业在遭受反倾销制裁时,能够及时调整出口策略,灵活进行企业出口产品的转换,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和持续发展。通过政策扶持,不仅可以更好地应对外来冲击导致的企业盈利减少、就业困难以及社会稳定压力等问题,还可以鼓励出口企业加大创新研发,从而实现我国向贸易强国和制造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Vandenbussche H, Zanardi M. The chilling trade effects of anti-dumping prolifera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0, 54(06):760-777.
- [2] Baylis, K. and Perloff J. M. "Trade Diversion from Tomato Suspension Agreement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43(1), pp. 127-151.
- [3] 杨仕辉, 邓莹莹, 谢雨池. 美国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 2012 (01):77-84.
- [4] 王孝松, 翟光宇, 林发勤.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J]. *世界经济*, 2015, 38(05):36-58.
- [5] 陈汉林, 孔令香. 美国对华反倾销出口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10): 45-51.
- [6] 李晓勤, 田曦, 应瑞瑶. 我国出口企业遭受反倾销后贸易偏转效应研究—以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 (03):143-146.
- [7] Bernard, A. B., Redding, S. J. and Schott, P. K., "Multiple-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witch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0(1), PP70-97., 2010.
- [8] Iacovone, L. and Javorcik, B. S., "Multi-Product Exporters: Product Churning, Uncertainty and Export Discove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0 (544), PP481-499 - 2010.
- [9] 钱学锋, 王胜, 陈勇兵, 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事实与解释, *管理世界*, 2013(01), 9-27.
- [10] Timoshenko, O. A., "Product Switching in a Model of Learn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95, PP233-249, 2015.
- [11] 仪珊珊, 张瀚元, 王昊天. 贸易自由化与出口产品转换: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08):28-36+87+135.
- [12] Berthou, A., Fontagne, L., "How do Multiproduct Exporters React to a Change in Trade Cost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2), PP326-353., 2013.
- [13] Qiu, L. and Yu, M. J., "Multiproduct Firms, Export Product Scope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working paper, 2013.
- [14] 亢梅玲, 李涛, 袁亦宁. 贸易自由化、产品组合与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7): 50-62.
- [15] 涂远芬.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调整[J]. *当代财经*, 2020(12):99-111.

- [16] de Nardis, Fabio. Il movimento antiglobalista, ovvero: genealogia e portata della società civile globale. [J]. Sociologia e politiche sociali., 2009, Fascicolo 1(1).
- [17] Alvarez, R., Zahler, A., "Export Mix Change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l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 [18] 易靖韬、傅佳莎、蒙双.《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转换与资源配置》,《财贸经济》2017年第10期。
- [19] 董银果、黄俊闻.《SPS措施对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基于前沿距离模型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
- [20] Samuleson P., 1952.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The term of trade when impediments are absent" [J], Economic Journal, 62(6), pp. 278-304.
- [21] Den, B.F.A.G. and R.H.J. Mosch, trust and transaction costs [A],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2003, T12003-08213.
- [22] Anderson J.E. and E.V Wincoop, 2004 "Trade cos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3), pp. 691-751.
- [23] Melitz, M.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4), PP1695-1725., 2003.
- [24] Nicita, A. and V. Rollo, 2015, "access conditions and Sub-Saharan Africa's exports diversification" [J], World Development, 68(4), pp. 254-263.
- [25] Balavac, M., and G. 2016, "The link between trade opennes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stitution and output volatility in transition country" [J], Economic Systems, 40(1), pp. 273-287. 98(2), pp. 529-534.
- [26] 蒋灵多, 陈勇兵. 出口企业的产品异质性与出口持续时间 [J]. 世界经济, 2015, 38(07): 3-26.
- [27] 高云舒, 尹斯斯, 黄震. 出口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企业产品配置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01): 47-61+135.
- [28] Lu, Y., Tao, Z., & Zhang, Y., How Do Exporters Adjust Export Product Scope and Product Mix to React to Anti-dumpi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2018, pp. 290-300.
- [29] 蒋为, 孙浦阳. 美国对华反倾销、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绩效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07): 59-76.
- [30] 陈阵, 孙若瀛. "反倾销、反补贴"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 由造纸业与橡胶业观察 [J]. 改革, 2013(07): 96-103.
- [31] 黄新飞, 李锐, 黄文锋. 贸易伙伴对第三方发起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01): 139-152.
- [32] 杜威剑, 李梦洁. 反倾销对多产品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09): 55-67.
- [33] 冯宗宪, 向洪金. 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 理论与经验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0, 33(03): 31-55.
- [34] 龙小宁, 方菲菲, Chandra Piyush.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种类溢出效应探究 [J]. 世界经济, 2018, 41(05): 76-98.
- [35] 戚建梅, 洪俊杰, 仪珊珊. 多产品出口对企业生存影响的微观数据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02): 25-37+135.
- [36] Mayer, T., Melitz, M. J. & Ottaviano, G. I. Market size, competition, 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495-536.
- [37] 孟宁, 周彦宁, 马野青. 反倾销、多产品企业与出口生存风险 [J]. 产业经济研究, 2020(05): 30-44.
- [38] 刘丁有, 薛静. 基于行业角度的印度对华反倾销贸易效应分析 [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6(05): 109-114.
- [????] Jabbour L, Vanino E, Tao Z, et al.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Chinese imports EU anti-dumping measures and firm performance [J]. Discussion Papers, 2016.
- [??] Lee M, Park D, Saravia A. Trade Effects of US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China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17, 31(01): 3-16.

- [41] Fontagne L., Orefice G., Piermartine R.. Making (small) Firms Happy: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Measures[R]. WTO working Paper ERSD-2016-03, 2016.
- [42] 汪亚楠, 周梦天.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减免与出口产品分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12): 127-142.
- [43] 汪颖博, 陈媛, 徐小聪, 徐阳. 贸易自由化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以加入 CAFTA 为准自然实验[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02): 63-76.
- [44] 樊海潮, 张丽娜. 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J]. 财经研究, 2019, 45(05): 139-152.
- [45] 田巍, 余森杰.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1): 28-44.

Study on Trade Diversion Effect of Antidumping on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

Xu Helian,Xu Zhipei

(Economy & Trade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079)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tching data of Global Anti-dumping (GAD) database, China Customs database and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uses the Differential Differential (DID)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nti-dumping on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adju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ort amount and quantity of the non-dumped products of the enterprises involved, that is, there is a "transfer effect of inter-product trade". In addition, anti-dumping has a differentiated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nterprises receiv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more likely to realize the transfer of export product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anti-dumping affects the export of non-dumped products by means of trade cos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on the one hand, export 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develop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and adopt active product adjust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export enterprises should be guide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anti-dumping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survival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cope with external shocks through policy support.

Keywords:(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Trade diversion effect;Multi-product enterprise;Differential model)